

晉江科任村的地下革命斗争

(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晋江科任村的地下革命斗争

(1941年9月—1949年9月)

1993年11月

目 录

- 一、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 二、“科任事件”的前前后后
- 三、“五一”事件陈相镖同志壮烈牺牲
- 四、镇压汉奸、反革命
- 五、反“清剿”、反“三征”、巩固发展基点村
- 六、歼灭敌人,迎接解放
- 七、科任支部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

晋江科任村的地下革命斗争

(1941年9月—1949年9月)

科任村位于晋江市东南海滨，3000多人口，主要从事农渔业生产。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贫脊，许多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谋生，成了华侨众多的侨村。1936年秋，科任办起了励菁小学，一批高年级学生受进步老师的教育和影响，向往进步，追求真理，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进步青年中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从此科任村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以崭新的面貌走上抗日和革命的道路。

一、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1、革命思想的传播

1936年秋，科任村原各姓家族会办的三所学堂（吕姓办的植才小学，陈姓办的玉峰小学，许姓办的育菁小学）合并办起了励菁小学，从外地聘请了十余位老师，其中一位泉州乡师毕业的徐萍踪老师，担任高一年级的级任。他思想进步，教学认真，在校两年时间，与当时泉州中心县委领导人李刚、许运伙以及朱汉膺等都有接触联系，他常利用课堂或业余时间向高年级学生特别是几位要求进步的学生，进行抗日救国、

社会进步宣传。如：(1) 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芦沟桥事变等等侵华历史和国民党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致东北和华北等地国土沦丧，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和灾难，激发学生不当亡国奴、不忘国耻的爱国热忱；国共合作抗日以后，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历程，讲中国共产党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启发学生对共产党的好感和对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崇敬；还介绍并组织阅读鲁迅、邹韬奋、巴金等进步作家的著作，与抗日有关的杂志《奋斗》、《萌芽》等刊物，及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书籍等，启发学生向往进步。(2) 教唱抗日和进步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渔光曲”、“新女性呐喊”、“铁蹄下的歌女”、“热血”、“面包歌”等。组织抗日宣传队，在街头巷尾宣传抗日，在学校、乡村演话剧。有一次在村中心墟内公演抗日话剧“义勇军进行曲”和“面包歌”引起全村轰动。在“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日，组织学生去坑西参加集会，听许运伙同志宣传抗日，唤起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家卫国。并把各个同学手头保存的书籍集中起来在村里办了一个“读书研究处”，无偿供群众借阅。还在村民聚集的“观音宫口”和“街顶”办时事快报专栏。(3) 讲自然科学知识，宣传无神论。如讲释迦牟尼和耶稣的来历和宗教的虚伪性、欺骗性，讲菩萨是泥土或木头做的，它“一声不叫，二眼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通，六神无主，七窍不灵，八眉无毛，九屁不通，十指不动”，启发学生鼓起勇气移风易俗，破除迷信。

1938年秋，陈相棕、陈煖漂、陈煖福、吕俊追、吕孙博、李天寿、李仁昌、林萱等一批学生毕业后考入泉州民生农校。在学校里，不论学习、劳动或课外活动都表现很好，深受老

师和同学的器重，还结识一些进步的同学，互相交换阅读进步书籍，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如参加泉城火炬大游行，到晋北和南门一带为抗日战士募捐等。

科任村的这一批青年学生，在徐老师的教育、熏陶、感染与影响下，并从阅读进步书籍和参加实际活动中，懂得不少革命道理，思想逐渐成熟，头脑里萌发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为共产党组织在科任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建立党的组织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纠集7个师8万多兵力，围攻在皖南抗日前线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搜捕监禁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泉州中心县委一些领导人有的被捕叛变，有的惨遭国民党杀害，一大批干部被迫转移隐蔽，党组织经历了一次严重挫折。面对这个严重的局势，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运伙，毅然决定把抗日救亡的各种公开活动转入秘密活动，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把党的干部转到农村去建立据点。在农村则以学校为基础去组织和发动农民。许运伙同志正是利用与其表弟、科任励菁小学校长陈秀莹的关系，于1941年9月派李友梅、叶长青（文霸）、陈志远（焕瑞）、李绵绵（吴珊）等党员来励菁小学任教并成立支部，书记李友梅。他们以学校作桥梁，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首先从受聘当代课老师的陈相棕入手，并通过他联系陈煖漂、陈煖福、林萱、吕俊追、吕清朗、吕一玲等一批老同学，又通过他们进而联系村里陈相鏢、吕俊番、陈煖屈、林久长等青年农渔民，向他们进行抗日战争形势的宣传教育。如揭露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向人民征收

粮食税款，不是用于前线抗日军费，而是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国民党消极抗日，使中国大片领土被日军占领，沦陷区人民饱受日寇统治、屠杀、掠夺之苦。宣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日，是抗日的中坚力量，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由于这一批青年早有进步要求，很快就成了党的基本群众。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41年10月，由李友梅同志介绍发展陈相棕、陈煖漂两人入党，至年底，又先后吸收陈煖福、吕俊追、林萱、陈相鏢、吕俊番、陈煖屈、吕清朗、吕一玲、吕秀鸾（德蓉）、林久长等人入党。

3、开展几项主要工作：

1941年10月31日下午许运伙同志不幸牺牲。当时许运伙同志和陈毕明、施干生同志在吕宅村“大门内”阁楼上研究工作。国民党保长郑文胡带两名乡警来收税，有一名乡警摸上阁楼，许运伙同志挺身与乡警搏斗，被乡警用步枪击中右腹部，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这是泉州党组织的一大损失。不幸消息传来，科任支部的党员，聚集在校长陈秀莹家，对许运伙同志的牺牲表示深切的哀悼！

许运伙同志牺牲后，为避免暴露目标，泉州中心县委机关由吕宅村暂时迁来科任。不久，闽南特委决定泉州中心县委改为泉州临时工委，书记吴天亮，组织侯如海，宣传朱伦炎，机关仍设在吕宅村。吴天亮、侯如海、朱伦炎等领导经常来科任指导工作。这一时期（1942年初—44年底）科任支部主要开展如下工作：

——训练党员，发展党员。1942年初，吴天亮同志在科任办一期培训班，多数党员都参加学习。主要内容：一是贯

彻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利用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二是进行共产党员标准，保守党的秘密，加强组织纪律以及革命气节等教育。这时科任村支部已有一批经历斗争锻炼的党员，培训班后又个别吸收吕子目、陈煖法、吕文锦、许锦章等人入党。

由于斗争需要，1942 春节前后，叶文霸、陈焕瑞、李友梅、陈煖福同志相继调出，去安溪等地开辟工作，吴珊接任科任支部书记。4 月，陈相鏢、吕清朗同志调去泉州党机关和外地工作，12 月底吴珊同志调去南安工作，科任支部书记由新调来的沿海区特派员史爱珠兼任。至 1942 年底，除调出外，科任支部有党员陈相棕、陈煖漂、林萱、吕俊追、吕俊番、吕一玲、吕德蓉、陈煖屈、林久长、陈煖法、吕子目、吕文锦、许锦章等十三人。

——贯彻“隐蔽精干”方针，暂停发展党员。1943 年 3 月，闽南特委全面贯彻“隐蔽精干”方针，切断横的关系，利用特派员、联络员的方式进行个别联系与个别领导，侯如海任泉州地区特派员，随后，侯如海同志决定沿海地区恢复委员制，史爱珠任区委书记，由陈相棕接任科任支部书记。泉州党的机关设在科任村。根据闽南特委和侯如海、史爱珠同志的指示，为适应艰险环境，巩固党的组织，科任支部对党员进行加强党性和党的组织观念、遵守党的纪律和保守党的秘密的教育；同时严格遵照“隐蔽精干”方针，一般情况不开支部会，不过组织生活，由支部书记对党员实行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也暂时停止发展新党员。

——采取多种形式，密切联系群众。首先以学校为阵地，举办青年、妇女夜校，组织青年、妇女自编自抄教材进行学习，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作为党联系群

众的一种形式；同时，党员分工，以渔船为单位，把渔民组织起来，如遇到国民党来抓壮丁时，就通知青年下船开往海里去；还利用“结拜兄弟会”、“父母会”、“南音会”等形式，联系群众，使党员扎根于群众之中。

——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根据党中央“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打入之”的指示精神，支部于1942年就有计划地安插党员去当保甲长，1943年通过竞选更“广泛地打入之”。先后派吕俊追、陈煖福当科任村保长，林萱、陈相棕、吕文锦当保队副，还有一些基本群众当了甲长。派陈煖漂参加“村自卫队”，吕俊番、吕子目、陈煖法等参加“冬防队”，名义是巡逻、守更防盗贼，实际是掌握群众武装；派陈煖漂利用与科任三青团分队长吕良式的同学关系，参加了三青团，目的是了解三青团内部情况。这样，科任村的国民党基层政权和群众武装团体大都掌握在我们党员或基本群众手里，以合法身份掩护党的活动，保护泉州党机关及领导的安全，保护群众的利益。例如有些同志外出活动带上个“路条”（通行证）、办个“良民证”就比较方便和安全。又如保队副去开会时是布置抓壮丁的，回来后就通知青年上山或下海回避。

——输送党员参加游击队。1943年7月，支部派林萱、吕俊番随侯如海等领导人去闽南特委机关学习，学习省委的整风决定和陈云同志“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学习结束后，林萱留下参加闽中游击队，吕俊番因病回科任工作。1944年10月，日寇再度攻占福州及连江、长乐等沿海地区，闽中游击队转移到福（清）、长（乐）、平（潭）及莆田等沿海地区，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1月科任支部先后派出支部书记陈相棕和吕俊追、吕文的等北上参加闽中游击队。吕一玲接任

科任支部书记。吕文的同志于1945年3月底在南日岛战斗中英勇牺牲。

——组织党员和基本群众去新山上开荒种地瓜、花生，依靠自力更生，解决当时党组织面临的经济生活困难。

二、“科任事件”的前前后后

1945年6月8日，中共闽中特委副书记蔡文焕率武装游击队计十二人，隐蔽在晋江县科任村，6月12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军警特务前来“围剿”，除两位同志脱险外，蔡文焕等十位同志被捕，发生了“科任事件”。

1、事件背景。

1945年5月21日上午，中共福建省委在长乐县南阳村召开会议，分析当时面临的紧急情况：5月18日日本侵略军从福州和连江、长乐等地撤退，20日驻守在福清、长乐一带的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一团纠集各县的“自卫大队”，开始向我闽中地区特别是省委机关驻地外围进逼。同时，鉴于日军已撤出福建沿海地区，伪“和平救国军”可能接受国民党的整编，“易帜反正”。为了适应新的政治斗争形势，省委决定：省委机关立即撤出南阳村；游击队进行整编，分成若干小分队进行活动；立即撤离隐蔽在伪军中的海上武装队伍。派粘文华同志前往湄州岛向海上游击队负责人张伯庭传达省委指示，并具体部署游击队撤出湄州岛。按省委决定的路线，从惠安后垵港登陆后，经三朱翻过山岭，穿过福厦公路进入惠安、仙游交界处三台垵隐蔽；同时，省委又派闽中特委付书

记蔡文焕率一个武装班计十人从陆路赶到惠安、仙游交界处，接应撤出来的海上游击队，重新组织分散活动。蔡文焕一行于5月21日下午从南阳村出发，步行十多里到了长乐海边牛头湾。这时又增加了王天民等四人。蔡文焕临时决定乘木帆船离开牛头湾奔赴湄州岛。5月22日下午当船行驶至兴化湾南日岛北侧海面时，与国民党军在海上的巡逻船发生遭遇战，我方王天民腿部中弹受伤。天黑后，我方的船开到黄瓜屿厝份停泊，除船工外，十四位同志均上岸在岛上隐蔽。6月6日，发现国民党军分乘几条木帆船由莆田埭头海面向黄瓜屿进军，并于7日进驻黄瓜屿。蔡文焕带领船上的武装班（除王天民留下养伤外）于6日晚撤出黄瓜屿，向南航行往湄州岛寻找隐蔽在伪军中的海上游击队。7日午后，船在湄州岛靠岸，蔡文焕等人到了原海上游击队的驻地，发现空无一人。后获悉，伪“和平救国军”已经投靠国民党军了，整个队伍移驻东埔村西垵。于是，船开往东埔村西垵，继续寻找我海上游击队。到了沃口，发现国民党军的哨船，又得悉我海上游击队已被国民党整编掉了。于是决定船迅速离开沃口向惠安县峰尾方向进发，这时又遭国民党军哨船尾追，我方的船开往大海，甩掉尾随的哨船。是夜，船开至湄州岛东南部海边停泊。当时，蔡文焕考虑与海上游击队联系不上，又发现莆田、惠安沿海港口已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船如果继续停泊在湄州岛东南部，可能遭国民党军的炮击；如果开往惠北三朱村要经过湄州湾的沃口，又可能与国民党军哨船再次遭遇。最后，蔡文焕采纳了武装班班长林萱的意见，开往林萱的老家——晋江县科任村。这次行军，由于蔡文焕擅自改变路线和所要去的地点，因而未能完成省委交给的接应海上游击队的任务，并导致了“科任事件”的发生。

2、事件经过。

6月8日早晨，蔡文焕率武装班计十二人（一个草药医生已在东埔村西垵上岸），乘船从湄州岛启航向晋江科任的海面驶去，8日下午一时左右，船到达科任村圳山南面停泊，林萱泗水上岸，到外东山的园地里，遇见科任支部党员陈煖屈，林就向陈说明蔡文焕带十二位同志乘船来到圳南停泊于龙虾门内。陈介绍了科任村有国民党自卫队十几人驻在华侨吕子清的楼房里。两人经商量，决定队伍晚上上岸，上岸后大家都住在林萱祖母睡的内厅西畔大房里。随后，陈煖屈返回科任村，向支部领导汇报，并通知林萱的父母亲做准备。晚上，林萱进村来到陈煖屈家，党员吕俊番、吕子目也在陈家。林萱写了一封简信给当时泉州中心县委负责人侯如海，告诉他蔡文焕率十多位同志由莆田乘船来到科任村，要他见信立即赶来科任村。信交科任支部转出去。后按原计划由林萱、吕俊番、陈煖屈、吕子目、吕良奎一起到圳山海边，准备接应同志们登陆上岸，但因台风前夕，风浪太大，船无法靠岸。吕子目、陈煖屈、吕良奎只好回家，并约好明晚再去。林萱、吕俊番就在海边石洞过夜。9日早晨林萱、吕俊番泗水登上船。晚上，吕良奎、吕子目、陈煖屈如约来到海边，于是蔡文焕、林萱等十二位同志就一一登陆上岸，吕俊番、吕子目、陈煖屈、吕良奎照料帮助有病的同志走动，于午夜到达科任村，住在林萱祖母睡的西畔大房里，同时船就由船长开往莆田去了。6月10日、11日隐蔽休息。6月12日早晨，蔡文焕、林萱及其父亲三人在驻地内厅谈话时，由于伪保长陈青山告密，驻科任村的原自卫队中队长张宜发突然推开内厅门闯进来，发现了蔡文焕和林萱后，随即去伪保长办事处带来三名敌兵，荷

枪实弹到林萱祖母住地抓人。经过一段时间争执搏斗，蔡文焕和林萱都被敌兵扣去，并押到伪保长办事处，锁在房间里，上午10点多钟由四名敌兵押解去深沪镇。

面对蔡文焕、林萱突然被敌兵抓捕的情况，科任支部紧急研究对策，派吕德蓉去吕宅支部找负责人许逊钿联系，要求派人向上级党组织报告，设法营救蔡文焕等，并帮助把隐蔽的同志转移出去；派陈煖漂以村自卫队员身份探听敌情，了解被捕的人关在什么地方；派吕俊番、吕良奎把尚隐蔽在林萱祖母住地的十位同志带出去分散隐藏在群众家里。吕德蓉去吕宅村找许逊钿，许逊钿带吕德蓉去坑边颜厝村找到颜竖，经商量，决定把隐蔽的同志转移出来后，安置在坑边颜厝北面一座偏僻的小庙里，并约定晚上7点由科任支部吕俊番把十位同志带出来，许逊钿等人负责接应。可是，这个计划还来不及实施，国民党当局就调动深沪、金井镇的大批军警特务押着蔡文焕于12日下午2点多钟包围了科任村。敌人一面召集保甲长及村自卫队开会，威胁说，这些人是“海匪”、“奸匪”，要村民协助缉拿，并扬言窝藏者同罪；一面把林萱家附近的西面片封锁起来，逐户搜查。结果，除有两位同志在群众帮助下脱险外，其余分散隐蔽的八位同志（内两位女同志）全都被捕，一批枪枝弹药及地下党文件也被搜获。这就是“科任事件”。

3、事件之后。

“科任事件”后，科任村的汉奸吕觉剑及三青团骨干、伪保长等反动分子都在互相表功，弹冠相庆。吕觉剑说，被抓的人是“共匪”、“海匪”。还说如果没有内应，这些人是不敢登陆的。他策划要在科任村抓所谓“内应”。国民党军警特务

也出动搜捕“嫌疑分子”。科任支部及时研究对策：一是利用同学、同宗等各种关系，了解敌人内部动态；二是向党员和基本群众说明这是一支抗日的武装，不是什么“海匪”，稳定他们的思想，振作革命意志；三是对可能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转移到外地隐蔽。支部还利用敌人恐惧心理主动出击。如有个地方绅士对吕觉剑等人说，被抓的人有武器，是红军，不是“海匪”。你们要考虑后果，不是没有报应的。我们的党员就向群众宣传说，这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是遇台风到科任避风的。抓他们是要受到惩罚的。那些反动分子害怕了，张宜发逃跑去厦门，有的跑去南洋。过一段时间，国民党和三青团两派力量在搞竞选，互相攻击，互相倾轧，无暇顾及抓共产党的事。于是“科任事件”引起的风波也暂时平息。

事件发生后不久，泉州中心县委派吴珊同志来坑边村颜厝。吕德蓉同志向吴珊同志汇报“科任事件”的情况，吴听后说，泉州中心县委负责人得悉“科任事件”的消息，曾计划集中一部分武装，在路上截救蔡文焕等人，因国民党连夜从海上转移未获成功。还由于蔡文焕的笔记本夹有一份泉州地下党一些党员、干部的名单落入敌人手中，敌人派出军警特务到处进行搜捕。中心县委虽已通知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及时转移和隐蔽，但仍有少数党员、干部被敌人抓捕。吴珊同志还传达上级的指示说，由于敌人搜捕，今后上级可能少来联系和指导，鼓励科任支部党员要坚持斗争，继续做好隐蔽工作，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

在“科任事件”中被捕的蔡文焕、林萱等十位同志于6月12日被押去深沪镇自卫队分队部，并连夜用船送永宁镇转押去泉州、莆田，除个别自首叛变外，大都英勇牺牲。蔡文焕在被捕的当天就对敌人说过我们还有一些人，引起敌人的注

意。因此，当科任村甲长陈铨补带着自卫队中队长、镇警等二十多人来科任村搜捕时，就把蔡文焕押回村来。蔡文焕指着在人群中了解敌人动态的科任支部书记吕一玲对搜捕的敌人说，她知道那两个女的在什么地方，致吕一玲被抓去保长办事处问话，她因未暴露身份而释放。1947年初蔡文焕被省保安一团杀害。方乌丹（女）被捕后自首叛变，多次带着国民党便衣特务抓捕我地下党员和基本群众，后来当了军统特务王介小舅子的老婆。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判刑。林萱被捕后，向省保安一团自首，当了保安一团谍报室主任、军统特务王介的勤务兵，但行动仍受到监视。1946年秋，林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避开特务的监视，分别与科任支部负责人吕德蓉，以及陈煖漂、陈煖屈等人接触，表明他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没有暴露科任党组织的任何情况，希望组织上给他争取立功的机会。以后经上级领导批准，科任支部负责人与林萱多次接触，林萱向组织提供了有关“五一”事件后敌人的动态等重要情况。1947年7月在戴云山战斗中不幸被捕的泉州中心县委委员郑种植等四人，于8月11日从莆田押来泉州，关在王介家果园后面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林萱利用看管“政治犯”的机会，与郑种植多次接触，并于8月14日午夜带领郑种植、付维葵、吴碧玉、吴秀琼等四位同志越狱，回到泉州中心县委所在地——内坑村。林萱同志也回到革命队伍，继续革命，在对敌斗争中表现英勇顽强，为人民立新功，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党组织的信任。

三、“五·一”事件陈相鏢同志壮烈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晋江县工委书记郑家玄在吕宅村召开会议，调整中共沿海区委领导成员，吕德蓉任区委委员兼科任支部书记。支部与上级保持经常的联系。这期间，支部的主要活动是：宣传我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巩固支部党员的团结，增强革命意志，消除由于“科任事件”产生的消极影响（如有的党员消极不干，有的出国）；开展秘密活动，发展一批政治群众，个别吸收党员。

1946年，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的和平民主意愿，积极准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我游击区和基点村进行疯狂的“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各地游击队活动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加强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省委决定进行必要的武装自卫和武装筹款。据此，泉州中心县委书记侯如海根据掌握的情况，确定了一个勾结官吏办信局、扣压华侨汇款、从事投机生意和海上走私的人作为斗争对象，并于5月1日组织一支临时武工队在晋江后溪实施这一斗争。由于在实施斗争中方法有失误，遭到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警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追堵击，又怕伤害群众而未敢进行有力的射击，以致斗争失利，牺牲了多位党的政治军事骨干，还暴露了党在这一地区的色彩，这就是“五一事件”。在这次行动中，泉州中心县委武工队队长陈相鏢，坚决执行组织决定，在不利的情况下，临危不惧，奋不顾身，掩护同志撤退，不幸在晋江大觉山脚下壮烈牺牲。

陈相鏢同志1923年11月26日出生于晋江科任村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从小饱受艰苦磨炼，年青时接受革命思想，投身革命，1941年11月在科任村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4月奉调参加泉州党领导的武工队，成为一名顾全大局，不怕牺牲，勇敢机智的军事干部。年仅二十四岁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9年6月，中共运伙区委为纪念陈相鏢烈士，把科任、吕宅、坑边三个支部组成的乡委命名为相鏢乡委，解放后科任村命名为相鏢乡（村）。陈相鏢烈士名垂青史！

“五一事件”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晋江沿海地区的地下党进行“清剿”和搜捕，有的党员被捕，有的组织被迫暂停活动，科任支部近半年时间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历经了抗日胜利后一段极为艰难的岁月。1946年冬，郑家玄同志来科任，向支部传达闽中特委决定给侯如海撤消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并任命许集美为泉州中心县委书记。同时传达泉州中心县委扩大会议精神，批判侯如海的错误，布置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等工作。此后，科任支部与上级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四、镇压汉奸、反革命

1947年1月，中共闽浙赣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决定》，2月闽中特委和泉州中心县委决定组织武装袭击晋江安海镇。按照上级的指示，科任支部派出党员吕子目、吕子汉同志，参加5月11日泉州中心县委领导的武装袭击安海镇的行动。6、7月间，闽中游击纵队转战戴云山失利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闽中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残酷的“清剿”，一大批党的干部和游击队骨干以及基本群众惨遭杀